

# 中德關係與中國現代化模式

• 陳意新

William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開創性研究

《德國與中華民國》(以下簡稱《德》)是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柯偉林(William Kirby)根據其博士論文修改而成。該書出版後在美國的中國學領域裏受到了很高的評價，被認為是研究中德關係史的一本「難以超越」的著作，是關於中華民國史的一項「極其出色」的研究<sup>①</sup>。在《德》出版以前，美國、德國和台灣的歷史學者曾發表過一些有關民國期間中德關係的研究論著，但柯偉林的研究在檔案資料的利用、論點的形成，以及研究的深度幾方面都遠遠超過了這些學者。就民國期間的中德關係史來說，《德》實際上是一項開創性的研究，但其重要性遠

不止於此。柯偉林極具眼光地將民國期間的中德關係置於整個中國近代史脈絡之內來考察，探討了國民黨政府與整個西方的關係，他的研究因此而為理解中華民國史乃至整個中國近代史都作出了有意義的貢獻。

《德》共分為八章，另有一篇引言與一篇結論。全書的重點是探討1928至1938年間中華民國與德國的一段特別親近的關係。《德》的中心論點可簡要概括如下：中德在國民黨南京政府時代的這段親近關係是建立在雙邊平等的基礎之上的；在德國方面，對東方市場的開拓和對礦產資源的需求是促成這段關係的基本動力，而在中國方面，基本動力則是對外國資本的尋求和現代化模式的選擇。儘管這段親近關係只有十年左右，但它對中華民國的政權建設、軍事制度、工業經濟以及意識形態都有着極為重要的影響。不幸，這段關係毀於希特拉之手，

為了實現其「世界權力」的野心，希特拉在1938年犧牲了中德關係，從而換取了日本與其站在同一條戰線上。需要在這裏指出的是，上述概括是非常簡單的，遠不足以說明《德》一書中所包含的許多洗練而又重要的論點。

## 哈佛學派傳統

柯偉林的主要貢獻在於他通過這一段中德關係的研究，具體地分析了中國近代史上現代化模式選擇的一個實例，探討了這一選擇的歷史成因、具體成效及其潛在的危險，從而加深了美國的中國學界對中華民國史的理解，豐富了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以來的哈佛學派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傳統。

費正清的中國史研究理論框架建構在50-60年代盛行於美國學術界的現代化理論之上，他對於中國近代史的「挑戰與回應」的基本看法已為許多中國學者所熟知：即在近代西方列強的壓力之下，晚清政府被迫開放門戶、興辦洋務，尋求富國強兵之道。費正清當然不會同意毛澤東的論斷：如果沒有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最終也會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在費正清看來，現代化是一種始自西方而逐漸向世界擴張的進程，中國社會內部不存在現代化的動力。因此，現代化不會從中國社會內部發展起來，中國在現代化方面所面臨的問題是模式的選擇。但中國選擇過甚麼樣的模式？為甚麼會選擇這一種或那一種模式？費正清和他早期的一些學生

諸如芮瑪麗(Mary Wright)、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等並沒有進行過深入的探討。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研究的重心是西學的東漸，比較強調西方世界對晚清帝國的衝擊，特別是西方思想給中國社會帶來的震撼。但柯偉林認為，現代化模式選擇決不簡單地意味着西方各種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它更體現在近代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裏與西方所進行的實質性接觸，而中德之間在1928-38年間的親近關係，正是這種實質性的現代化模式選擇的一個範例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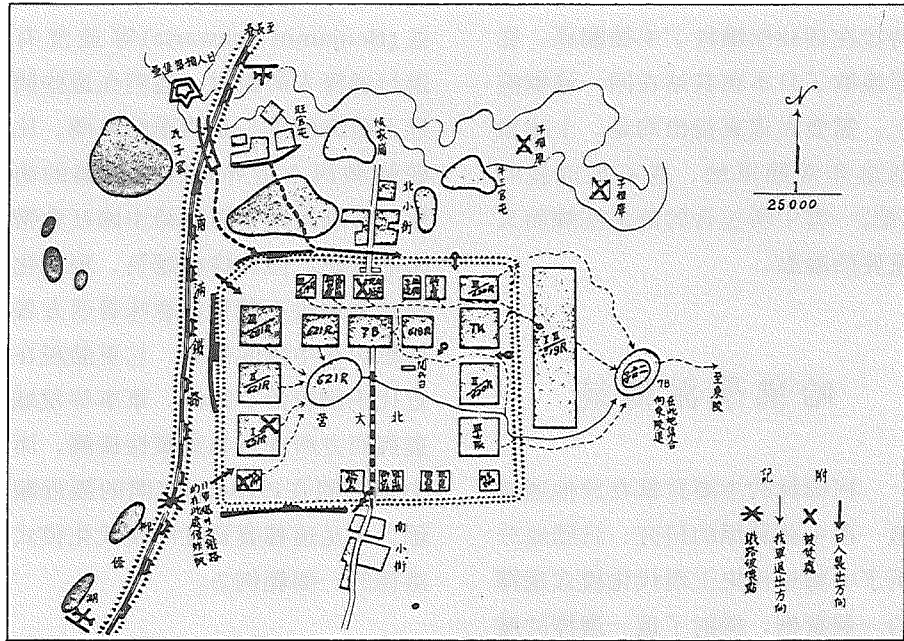
## 中德平等交往的開始

為甚麼中國會選擇德國？這當然取決於具體的歷史條件。柯偉林認為，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加入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行列，中德關係因而處在不平等的狀態。戰後，作為戰敗國的德國於1921年取消了在戰勝國中國的治外法權，此舉為日後的中德關係發展奠定了平等的基礎。為了實現戰後的經濟重建和擺脫凡爾賽和約的限制，德國此時開始着意於東亞的市場，而中國的南方國民黨政府也恰好在積極尋求外援。但英、美、日、法在1919年為促成中國內戰的結束而決定禁止對中國輸出武器，同時它們亦未終結強加給中國的種種不平等條約，因此對孫中山來說，要結束北洋軍閥的統治和發展他宏偉的實業計劃，只有向平等對待中國、同時亦具有實力的德國和蘇聯尋求幫助。儘管

中德在國民黨南京政府時代的親近關係是建立在雙邊平等的基礎之上的。儘管這段親近關係只有十年左右，但它對中華民國的政權建設、軍事制度、工業經濟以及意識形態都有着極為重要的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作為戰敗國的德國於1921年取消了在戰勝國中國的治外法權，此舉為日後的中德關係發展奠定了平等的基礎。

「九一八」使國民黨把經濟建設的核心改變為國防經濟，為「九一八」事變現場圖。



南方國民革命政府與德國有所接觸，但德國對中國內部安定性的觀望態度則促成了孫中山作出了唯一的選擇：接受蘇聯的援助。不過在柯偉林看來，孫中山與德國的初步接觸，業已為以後的國民黨政府與德國進一步加強關係建立了渠道。

蔣介石1927年奠都南京後，國共合作破裂，中蘇關係惡化，中國內部亦未統一，這時對蔣來說，急務莫過於加強軍事實力和重新尋求外援。英美諸國對蔣的反應是冷淡的，它們不信中國具有償還外債的能力。它們希望能先向中國提供經濟顧問，待中國整頓好財政的混亂局面之後再考慮向中國貸款。英美諸國的冷漠使它們失去了在中國建立主導性影響的一次歷史性機會，使得德國人有幸向中國捲土重來。當然，機會並不是中德親近關係形成的唯一因素。在柯偉林看來，蔣介石對軍事實力的尋求亦起了極為主動的作用。德國的軍隊無疑是世

界上首屈一指的，德國在軍事方面的經驗可以成為中國的楷模，蔣介石本人對德國軍事的景仰亦是有案可稽。因此，在曾留學於德國的國民黨要員朱家驊的安排之下，在國民黨元老張靜江與戴季陶的支持下，蔣於1927年正式邀請了馬克斯·鮑威爾為首的德國軍事顧問團來華。鮑威爾的到來不僅使中華民國與西方諸國的關係開始傾向德國，更為重要的是它使國民黨政府現代化建設模式的選擇逐漸轉向了德國。柯偉林認為，鮑威爾顧問團對中國的影響是很重要的：第一，它以德國的軍事制度結構改造了南京政府的軍隊，使這支軍隊成為獨立於黨派和政府部門之外而只聽命於其最高統帥蔣介石的國家軍隊；第二，鮑威爾促成了德國工業界聯合會代表團1929年初的訪華，從此開始了德國政府在經濟、文化上與中國的直接往來；第三，鮑威爾個人的軍事—工業一體化概念對蔣介

石及其追隨者產生了很深的影響，不僅使他們了解到工業對軍事的重要性，而且更使他們意識到軍事—工業一體化是一個經濟建設體系。

## 國防經濟

促成南京政府最終選擇德國作為現代化模式的轉折點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如果1931年以前國民黨政府還在西方各國以及日本之間尋求現代化模式，還在思考如何去實現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實業計劃的話，那麼九一八事件之後經濟建設的核心毫無疑義地變成了國防經濟，以防備未來的中日戰爭，德國轉而成為選擇的楷模。在柯偉林看來，選擇德國並不僅僅在於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經濟復興為國防經濟式的現代化提供了樣板，而且還在於德國可以提供國防經濟所需的大量資金。1932年蔣介石創立了由翁文灝主持的「國防經濟設計委員會」(即後來的資源委員會)以設計未來的經濟政策，其結果是形成了以中南的江西與湖南湖北為中國的新經濟中心、以發展重工業為主、以國家獨佔資源為手段的一套中國工業經濟發展策略。但問題是，資金沒有着落。1928年田賦歸省之後，中央政府已不可能從業已貧困的農業中提取工業建設所需的資本積累。作為政府大項收入的關稅業已為償還北洋政府所欠的大批外債所牽制，而其他列強則只是袖手旁觀，因此工業發展所需的資金便只能向德國尋找。而在德國，希特拉1933年1月上台之後重

新武裝軍備，則促使德國積極地向中國尋求軍火工業所需的礦產資源，特別是鎢礦砂。這一互動的結果是雙方創意性地發展起了補償貿易，即以中國的礦業資源交換德國的軍事裝備、工業設備及製成品。至1936年，中國已成為德國在非歐洲國家之中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德國對中國的出口量僅以1%少於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量，居世界各國對中國出口量的第二位。柯偉林認為，中德之間的關係是頗有點令國民黨政府揚眉吐氣的。中德的親近建立在對等的物物交換關係之上，中國政府不必為借錢而向列國乞討。這種貿易關係反過來促使英國政府不得不重新審視它對中國的經濟政策。更富有意義的是：德國復興的一整套經驗，將通過緊密的經濟聯繫而直接應用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中。

## 德國意識形態的滲透

柯偉林的論點並未停止於此。《德》還進一步探討了德國模式在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生活方面對中國所產生的影響。由於中德的親近，德國的意識形態也開始滲入中國，1930年代中國出現了很強的法西斯主義思潮，具體到社會政治生活中則是黃埔系中藍衣社的興起和國民黨政府旨在改造中國人國民性格的新生活運動。面對着德國的經驗，中國政界和思想界的許多領袖人物不僅接受了威廉帝國以來的戰爭經濟概念，更把希特拉上台之後的法西斯化當作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階段

中德貿易關係反過來促使英國政府不得不重新審視它對中國的經濟政策。更富有意義的是：德國復興的一整套經驗，將通過緊密的經濟聯繫而直接應用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中。

和民族精神重建的道路。柯偉林認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只是中德這一段經濟上親近關係的副產品。在仔細地檢查了藍衣社人物的思想和新生活運動的語言之後，柯偉林斷言1930年代中國並不存在一場歐洲意義上的法西斯主義運動，關鍵在於中國的所謂法西斯主義者未能理解法西斯主義的本質。法西斯主義本質上是一場運動，是一場大規模的促成法西斯分子自下而上地掌握政權的社會運動，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建立社會秩序。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者只是想模仿希特拉的法西斯政權，他們未能理解德國法西斯主義運動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諸如「民族」與「種族」的區別。中國所出現的法西斯主義思潮，足以說明在現代化模式的選擇中，意識形態的因素很容易隨着經濟、政治、文化關係的親近而從一個民族社會滲入另一個民族社會。但柯偉林認為，這種滲入很難還會是原來意識形態的面貌。例如，以強調勤儉與服從為核心的新生活運動，實際上是德國民族精神和孔孟儒教信條的一種混合，而「法西斯主義」一詞除了一度被譯成「棒喝團」之外，從未像「民主」、「共產主義」等西方辭彙被對等地譯成中文。翻譯的困難正好說明了對外來意識形態理解的困難。

### 德國模式的影響 和潛在危機

在柯偉林看來，國民黨政府選擇德國作為現代化模式有着一定的

積極意義。它使國民黨政府確立了以國防經濟為核心的經濟建設方針，展示了國民黨政府認真建設現代化的意圖。就政治軍事角度來說，這一選擇使蔣介石有機會鞏固自己的權力，進而加強了國民黨政權在中國的統治。就經濟角度來說，這一選擇促成了中德間的親近關係，使國民黨政府能够在德國的幫助下有計劃地着手工業建設。德國不僅在中國的航空、鐵路、汽車、軍事等工業留下了痕迹，而且還為中國訓練了一批技術、管理、科學乃至高層決策的人才。柯偉林在論述國民黨政府現代化模式的選擇時，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落入費正清挑戰與回應理論的窠臼，着意地指出這一選擇並非完全是單向度的：德國對東方市場和中國資源的積極尋求，也同樣是促成中德這一段親近關係的主要原因。但對於國民黨政府這段時期的現代化建設，柯偉林認為很難給予較高的正面評價，因為1937年中日戰爭的爆發徹底打斷了國民黨政府的建設進程。沒有歷史事實能够證實這樣的論斷：如果沒有中日戰爭，國民黨政府必然會建成一個現代化的中國。

事實上國民黨政府的現代化模式選擇也包含着許多困難和危險的因素。例如，蔣介石按德國軍事制度改造中國軍隊所需的費用，遠遠超出了當時中國經濟的承受能力，資源委員會的宏大工業建設計劃也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實際。中國可以用礦業資源向德國換取所需的重工業設備與軍事裝備，但開採資源本身所需的大批設備和交通設施的建設，則又另外需要大量的資金，

特別是要把鎊砂從贛中南山區運出來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在資金仍然極度匱乏的情況下，中國的工業化是否能以國民黨政府所期望的速度發展是極其令人懷疑的。然而，在對德國模式這一歷史性的選擇裏，最大的危險莫過於選擇上的依賴性。國民黨政府把工業化建設奠立在德國援助這一基礎之上，一旦德國從中國的現代化抽身而出，國民黨的工業建設政策便會立刻瓦解，這也正是1938年希特拉中斷中德經濟關係之後中國的真實寫照。在中國近代史上，這種單一性現代化模式選擇的困窘並不獨屬於國民黨政府所有，而是屬於整個中華民族，因為中國共產黨在1949-1959年與蘇聯的特殊親近關係正好重蹈了國民黨的覆轍。在這種意義上，毛澤東的「自力更生」政策倒不失為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經驗教訓的總結。但中國的建設是否應該像國民黨政府後來在台灣那樣以發展社會的私有經濟來作為現代化的動力，或像共產黨政府在大陸那樣以加強國家統制的經濟來作為現代化的動力，這不是柯偉林書中所討論的題目，當然也更越出了本文的範圍。

### 國民黨自主政權說

作為一本研究中華民國史的著作，柯偉林在《德》一書中的另一貢獻也應該一提：即國民黨政權性質的界定問題。在柯偉林之前，易勞逸先生(Lloyd Eastman)在他對中華民國的研究中提出：國民黨的政

權是一個沒有任何社會基礎而靠軍事力量支撐着的「自主政權」。易勞逸認為，國民黨在1927年之後已經失去了往日革命政黨的性質，腐敗從此成為國民黨統治集團的特徵。這個政權不代表任何社會集團的利益，當然也就得不到任何社會力量的支持。當抗日戰爭來臨，國民黨力量潰退西南之後，共產黨的力量則在華北華東等地填補了國民黨留下的空間。一旦日本人敗退，國民黨政權因其本身腐敗已無法有效地動員起力量應付共產黨的挑戰。易勞逸關於國民黨政權的界說，實際上是對美國政界、外交界和學術界在50-60年代以美國為中心來討論「誰丟失了中國」這一命題的批判。他的觀點得到了他的學生柯博文(Parks Coble)的有力支持。柯博文在他自己的研究裏證明了除了在1927-29年這一短暫期間外，國民黨政府與江浙財團基本上處於對立狀態：即中國的大資本家並沒有支持國民黨政權<sup>③</sup>。

在美國易勞逸的「自主政權」說



蔣介石在江西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不一定是為了替法西斯主義的藍衣社提供大眾化組織作準備。

是民國史研究中的權威性觀點，它受到了一些美國學者的批判，然而它卻更為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學者所反對。大陸的學者當然認為蔣介石政權代表着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因此而為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所推翻。台灣的學者則認為國民黨政權受到了中國社會的擁護，如果沒有日本人的侵略突然打斷民國期間的建設，沒有共產黨人的造反，國民黨政權一定能夠將中國引上現代化之路④。

柯偉林沒有正面回答國民黨為甚麼會從大陸敗退的問題，但他的研究修正了易勞逸關於國民黨政權的一些論點。例如，民國期間並沒有出現一場像易勞逸所聲稱的法西斯主義運動，而只存在着一些法西斯主義思潮，換言之，即國民黨政權沒有反動地走向法西斯化。再比如，國民黨政權亦並未像易勞逸所說的那樣腐敗，像以翁文灝、錢昌照、俞大維、張公權等為首的資源委員會和經濟建設部門基本上是由一批優秀、廉潔、誠實的幹才所組成。但在基本立論上，柯偉林的研究有力地支持着易勞逸的「自主政權」說。

柯偉林認為，國民黨政權積極地向西方尋求現代化模式本身就反映了這一政權沒有穩固的社會基礎，因為不穩，所以急於尋求外國模式。如果分析國民黨政權的經濟政策，「自主政權」更容易得到體現。在資源委員會所設計的工業經濟戰略中，沒有任何觀念表明國家經濟如何與私有經濟、通商口岸經濟、農業經濟進行協調以取得整個經濟的均衡發展。所謂工業經濟戰

略只不過是獨立於其他經濟之外的國家控制下的經濟，這說明其他經濟利益並不在國民黨政府的考慮之中，換句話說，國民黨政權並沒有代表其他社會經濟集團和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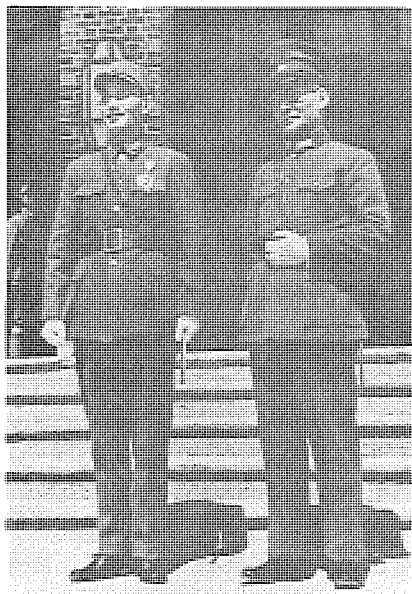
## 普魯士軍官團理念的誤用

在「自主政權」說上更有說服力的是柯偉林關於蔣介石軍事力量形成和瓦解的分析。自1927年鮑威爾擔任軍事顧問之後，蔣介石便按照鮑的建議改造自己的軍隊。1933年在德國名將塞克特訪華並隨後擔任軍事總顧問之後，蔣介石更是全盤地接受了德國的軍事建制。最重要的是，他深深地受到了塞克特軍事思想的影響。塞克特教給蔣的最重要一點是普魯士軍事思想的核心：軍官團制。即以訓練軍事精英作為國防軍隊的支柱，一旦湧起戰事，軍官團不僅能以其優秀的質量勝過敵方軍隊龐雜的數量，而且還能迅速地動員起軍事後備力量，以國防經濟為核心而將整個國家推上國防戰爭或者後來稱之為總體戰爭的狀態。塞克特的軍事思想對蔣所產生的具體影響則是廬山軍官訓導團和蔣嫡系軍隊的建立。這種基於國防軍原則之上而建立起來的蔣軍確實為鞏固蔣的個人權力起到了作用。但蔣介石未能真正理解塞克特軍事思想的要害之處，未能把西方的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普魯士軍官團的理念是基於對外戰爭，它與國防軍體系和現代國防經濟軌道融為一體。而蔣所建的嫡系不僅是為了對抗外敵，同時更是為了對付地

方軍閥與共產黨。既然如此，蔣的軍隊便不能脫離中國社會的基礎。但蔣介石事實上則把嫡系建成了一支脫離社會，只忠誠自己的軍隊，支撐着自己的政治權力。柯偉林認為，從軍隊建設的角度來看，反而是毛澤東的做法來得高明些。毛澤東的軍民魚水觀念更符合中國社會的歷史條件，而蔣介石所追求的軍事現代化恰好是使魚兒離開了水。因此當蔣軍在上海與南京地帶與日寇血戰而覆滅之後，蔣本人再也沒有發號施令的本錢，不得不在西南與地方軍閥龍雲、劉湘在軍事事務上討價還價。蔣的嫡系的形成與瓦解以及蔣的權力的膨脹與受制，恰恰說明了國民黨政權是一個靠軍隊支撐着而沒有社會基礎的「自主政權」。柯偉林對蔣介石的軍事現代化的分析實際上回答了國民黨為甚麼會在大陸潰敗這一問題，只不過他沒有明說。

## 結語

毫無疑問，《德》是關於中德關係、中華民國史和中國近代史的一部極其出色的著作。柯偉林的研究主要圍繞着國民黨國家政權的活動而展開，這一點很好地回映了其在哈佛的導師孔飛力(Philip Kuhn)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國家與社會」的研究模式。柯偉林考察中德關係在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則很好地回映了其在哈佛另一位著名同事入江昭(Akira Iriye)關於國際關係史研究中兩個民族社會「相互印象」的研究模式<sup>⑤</sup>。因此，



當蔣軍在上海與南京地帶與日寇血戰而覆滅之後，蔣介石不得不在西南與地方軍閥龍雲在軍事事務上討價還價。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德》也有許多可取之處。

但《德》一書並非完全沒有爭論的餘地。例如柯偉林認為，新生活運動是源起於德國民族性對中國的影響，是蔣介石企圖為法西斯主義的藍衣社提供的一場大眾化組織的運動，這是一個很可以再討論的論點。在蔣介石的倫理道德與治國治軍思想裏，的確有着從塞克特那兒接受來的普魯士軍事倫理以及對德國民族精神的欽佩，但也更有着孔孟儒家的倫理、日本陸軍學校中所接受的基於武士道的軍事觀念、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湘軍將領曾國藩、胡林翼的治軍與倫理思想，以及他皈依基督教之後所學到的基督教衛理公會倫理。蔣本人沒有明確說過他發起新生活運動是因為受了德國思想的影響。此外，新生活運動發軔於剿共之後的江西，它的實際起源和當時蔣介石和宋美齡與之直接往來的美國傳教士有很大的關係。所謂改造中國國民性的新生活運動實際上是個雜燴，起勁的人物

從軍隊建設的角度來看，毛澤東的軍民魚水觀念更符合中國社會的歷史條件，而蔣介石所追求的軍事現代化恰好是使魚兒離開了水。



在選擇外國現代化模式中，外來的意識形態能在甚麼程度上真正影響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值得再分析。

則是從其中各取所需：宋美齡和美國傳教士則取其基督教的仁愛，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則取其儒家的禮義廉恥信條，藍衣社則取其法西斯主義的領袖概念，而熊式輝和文群則取其經濟要義以助恢復剿共之後的江西農村社會經濟秩序。柯偉林斷言新生活運動源起於德國的影響以及其與藍衣社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基於以上各點，他的論點確有值得討論的地方。而更進一步，在選擇外國現代化模式中，外來的意識形態能在甚麼程度上真正影響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就更值得再分析。除了新生活運動之外，關於國民黨政權性質的界定仍然可以討論。例如，柯偉林提到了胡適、翁文灝、何廉等一批優秀知識分子進入政府任職，他們此舉是否意味着知識分子群給與國民黨政權以一定的支持？如果不是，那麼這些學而優則仕的知識分子進入政府的動機應該從甚麼角度去理解？如果是，那麼就很難斷言國民黨政權是一個只憑軍事力量支撐着而沒有任何社會基礎的「自主政權」了。

儘管存在着爭論的餘地，但這並沒有削弱《德》一書的價值，相反，它更可以使後來的學者獲得一個新的研究起點，從而產生出更富有意義的研究成果。

### 註釋

① 美國學者關於《德》的書評，請參閱：*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 44, 1985, pp. 594-96; *Pacific Affairs*, V. 58, spring, 1985, pp. 113-15;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 20, 1986, pp. 101-2.

② 關於費正清等人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請參閱：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I (New York, 1978); Mary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1957);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1964).

③ Lloyd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1974); Parks Coble: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1986).

④ 關於美國學者對「自主政權」的批判，請參閱：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Hawaii, 1985); 關於大陸學者的不同解釋，請參閱張憲文主編：《中華民國史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關於台灣學者的不同解釋，請參閱薛光前主編：《艱苦建國的十年：民國16年至民國26年》(正中書局，1971)。

⑤ 關於孔飛力的《國家與社會》研究模式，請參閱 Philip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8-1864* (Cambridge, 1975)；關於入江昭的「相互印象」研究模式，請參閱 Akira Iriye, ed.: *Mutual Images: Essays in American-Japanese Relations* (Cambridge, 1975).

陳意新 1953年生。1981年獲安徽師範大學歷史學學士學位，1984年獲南京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現為美國聖路易斯市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著作有《走向現代國家之路》(與錢乘旦合著)。